



星期文库

生活器物之二

盖碗中的道法自然

赵华

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使用盖碗喝茶的习惯,无论是居家自饮抑或待客,还是到茶馆茶友雅谈,都离不开盖碗。

唐代,出现了早期的盖碗。相传唐宝应年间,西川节度使崔宁爱好饮茶,其女也有同好,且聪颖异常。因茶盏注入茶汤后,饮茶时很烫手,殊感不便,其女便想出一法,取一木盘垫托在茶盏的下面。但刚要喝时,杯子却滑动倾倒,遂又想一法,用蜡在木盘中做成一茶盏底大小的圆环,用以固定茶盏,这样饮茶时,茶盏既不会倾倒,又不致烫手。这就是最早的茶船子。后来又让漆工做成了漆制品,称为“盏托”。

到了明清,盖碗的形制逐渐定型,包括茶盖、茶碗、茶船子(即“茶托”)三部分,又称三炮台。明清两代,喝盖碗茶之风日趋流行,清代尤盛。在官场,还形成了端茶送客的惯例。那时,官宦人家待客必有盖碗茶,彼此交谈,不觉时光推移。此时,如果客人谈兴未减,或者话不投机,主人往往端起盖碗,示意仆人。仆人心领神会,高喊:“送客!”访客会比较知趣地离开,这叫“端茶送客”。

在中国,器物的形制往往反映国人的哲学观、宇宙观,盖碗也不例外。盖碗,上配盖,下配茶托,被茶人们称为“三才碗”。所谓“三才”指的是天地人,语出《易·系辞下》“《易》之为书也,广大悉备,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两之,故六。六者,非它也,三才之道也”。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,认为人与天地自然休戚与共、和谐共存,而且人道可以与天道、地道会通,正所谓道法自然。一个小小的盖碗就是古人道法自然的结果,“盖”代表天,“碗(盏)”代表人,“托”代表地,“三才观”就这样在盖碗中得到完美地体现。

器物构造的本质在于实用,盖碗道法自然的结果,就是适合人的使用。茶碗上大小,盖可入碗内,茶船做底承托。喝茶时不必揭盖,只需半张半合,茶叶既不入口,茶汤又可徐徐而出。鲁迅先生在《喝茶》一文中曾这样写道:“喝好茶,是要用盖碗的。于是用盖碗。果然,泡了之后,色清而味甘,微香而不苦,确是好茶叶。”

盖碗之妙,妙在器与道的浑然一体。天覆地载,人居其中——茶盖倾侧是天意流转,茶碗中汤是人心沉浮,茶托稳承是大地厚德。饮者以盖拨茶,轻重之间,调的不只是茶汤浓淡,更是人与天地交感的那一份分寸与从容。一只小小的盖碗,让“道法自然”不再是玄奥的经书训诂,而成了唇齿间一次具体的温热,指尖上一回可触摸的平衡。器以载道,道以润身,这正是中国器物最动人的地方。

二道墙内,这里和八年前一样,依然摆着一品红,红得明艳。我走到祈年殿,看见殿的进出口前搭起了遮雨棚,围起了长长的铁栏杆,在栏杆通道里排队的人,长若游龙,人如蚁动。丹陛桥两旁摆满了一盆盆三角梅,是八年前没见过的。紫红色的三角梅,在风中摇摆,像是翩翩起舞的紫蝴蝶。

我又走到了双环亭,和八年前一样,这里还是人满为患。长椅上依旧摆着那么多吃的喝的,依旧那么多人衣着鲜亮,头巾鲜艳,笑语欢声,嘈嘈杂杂,大珠小珠落玉盘。年年岁岁,节相似,人相似。

很想找个地方,坐下来,画一张画,依旧没能画成。只有眼前所见的聚会,仿佛一簇簇盛放的花,还是那么热闹。我想起了八年前,我们“九大员”在大碗居的聚会。

自从那一次聚会,我们“九大员”再没能聚会。

我们“九大员”,如今都八十上下,垂垂老矣,已经病故先走了两位,剩下的七位,有的每天骑着“电驴子”忙着接送孙子上下学,有的有病,有的住进了养老院……锣齐鼓不齐了,再次聚会,真的难了。

流年似水,八年过去了。不知道,我们还有几个八年?

回到家,我画了一张画,画了九把空椅子。因为我忽然想起了在戏剧学院读书时,看过尤奈斯库的话剧剧本《椅子》。满台挤满了空椅子,没有一个人。

还可以继续等下去。“撤回”不一样,它是刚刚存在过,又彻底抹除痕迹。对话框干干净净,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只有当事人清楚,那些斟酌、忐忑、欲说还休,真实地在心底翻腾过。

很多人际的遗憾便是如此吧。不是无话可说,而是有些话已经写好,却终究选择收回,没有解释,一段心事,就此无声湮灭。

终止符。四舅和大伯都在六十多岁时离世,算下来,他们这辈子也只走过六十多个秋天。四舅妈后来经历过一场重大车祸,虽然侥幸活了下来,但大脑受了重创,神志不清,再也无法在秋雨绵绵的日子里,来我家流畅地讲她那些见闻了。

想来,乡下人一生里能“闲下来”的日子本就很短,能在秋雨中得闲的时光就更短暂了。年轻时,大伯和四舅心里装着全家的生计,很难静下心来安坐;唯有到了五六十岁,才能真正慢慢放慢脚步,在连绵的秋雨中静坐、串门,做一回真正放松的自己。

如今,每年秋雨落下时,80多岁的大妈还会如往常一样扎笤帚,但一上午最多只能扎一把,衰老如一根无形的绳子,将她越捆越紧。而我家门前再也见不到四舅和四舅妈的身影了,四舅妈肚子里的那些故事,也被秋雨淋得发不了芽了。

今年秋雨又落时,我坐在老屋门前,看着雨水落在石块上,碎成转眼就消失的水花,就像四舅和大伯匆匆走过的一生。

勇,便依依散席了。

出饭店,过马路,不几步,便是天坛北门。我准备去天坛转转,问大家谁去?都累了,都兴趣不大,都摇摇头。开车的,打车的,骑车的,溜达着走的,一个个扬长而去。

那一天,我独自去了天坛,进北门,就看见过节的花坛已经摆了出来,一盆盆的一品红,火苗一样窜起,鲜艳照眼。再往里面走,走到月季园前的藤萝架,一直走到双环亭,亭中的长椅上、亭前的草坪上,都坐满了人。我转了一圈,想找个座位坐下歇会儿,画张

空椅子

肖复兴

画,没有找到。

很多人是来这里聚会的,一拨拨的,人多的、人少的,全是女人的、全是男人的,还有男女结伴的,错杂在一起,像是在开分组讨论会,笑语欢声,嘈嘈杂杂,大珠小珠落玉盘。他们都穿着漂亮的秋装,特别是女人,不管年龄多大,都披戴着一条鲜艳的头巾,全是为了聚会时拍照留念。公园景色做背景照出的照片,当然比在杯盘狼藉的餐桌前好看许多。

今年中秋前夕,我重游天坛。因中秋节和国庆假期近乎连在一起,天坛里的人显得更多。我走到北门的

“输入”与“撤回”

晓奕

前,却被亲手销毁。如同剧中老人搬来满屋椅子,邀请满座无形宾客,期盼演说者道出毕生心里话,到头来,演说者竟是哑巴,所有倾诉,归于虚无。

戈多至少留给人遥遥的盼望,你

秋雨下起时,家里常会有客人来串门,四舅和四舅妈是最常来的。他们一进门,母亲就要张罗做一大桌好菜,同时备上瓜子、酥糖、红薯干等零食让大家边唠边吃,大伯也会特意过来陪客吃饭。

他们远道而来主要是凑在一起闲聊。出生在城里的四舅妈眼界开阔、见识面广,天生就会讲故事,过去的、

秋雨闲短

立新

当下的,稀奇古怪的、正儿八经的,她都能娓娓道来,用母亲的话说就是“说得有鼻子有眼”。四舅则坐在一旁抽着烟,满眼欣赏地看着她,时不时顺着她的话头搭两句佐证。四舅妈讲的那些故事生动有趣,还带着点生活里的哲思,全是我之前闻所未闻的,不少片段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这些都是记忆里美好的画面,可变故说来就来,轻易就给往日画上了

八年前,2018年,中秋节前夕的中午,我们“九大员”,在天坛北门的大碗居饭店聚会。

“九大员”,是我们九个中学同学。1968年夏天,我们同坐一列绿皮火车,离开北京,落户北大荒大兴岛同一个生产队。同在异乡为异客,我们友情加重,常形影不离,于是被队上的人戏称为“九大员”。此称谓有时代色彩,盖因当时流行的一个演唱节目《八大员》,唱的是部队炊事员、卫生员、通讯员等后勤的“八大员”,大伙遂诙谐称我们九人为“九大员”。

离开北大荒,刚刚返城那几年,我们“九大员”常聚会,一般都是到各家,很少到饭店,连小饭馆也很少去。那时候,大家经济都不富裕,到家里,自己炒两个菜,到副食店买几个凉菜,备一瓶北大荒酒和几瓶啤酒,就齐活了。各家的住房都很窄巴,“九大员”聚齐,椅子都不够,不是从邻居家借,就是把桌子移到床边,人挤到床上,如当年在北大荒老乡家的炕上,盘腿而坐。记得有一次,挤到床上的人多,喝到兴头上,手舞足蹈,床板不结实,竟然把床板坐塌了,引得大家哈哈大笑,成为那一次聚会的高潮。

2018年,是我们去北大荒五十年。半个世纪,好家伙,居然是半个世纪了!

一眨眼的工夫,青春如同肥皂泡一般破灭的梦,只留在遥远的记忆里。年龄陡增,酒量锐减,一瓶北大荒白酒,一瓶梅子酒,都没有喝完,各说各家,各种病纷至沓来,好汉不提当年

有人说,即时通讯软件对话框上显示的“对方正在输入”,是现代人的《等待戈多》。屏幕亮起提示后,我们守着一份渺茫期待,等候一段不知会不会到来的话语,等待本身,在那一刻就成了全部意义。

而“对方已撤回”或“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”的提示,更像尤内斯库《椅子》里那一场落空的演说。千言万语已经成形,即将交付,临到对方接收

秋雨下起时,就不适合在户外劳作了,乡人们也会被迫“闲起来”。可大妈闲不住,她会趁机坐在堂屋里扎笤帚。锤子敲、绳子勒、木楔楔紧……扎笤帚的繁琐工序,我全程看了下来,大妈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,可一上午最多也只能扎出三把笤帚,拿到镇上卖,一把大约能卖两元钱。

大伯不帮大妈扎笤帚,他坐在餐桌的正上方,喝着自采的茶,吃着自腌的嫩姜,神情松弛自在。农人手头上的活永远干不完,只有雨天才能名正言顺地待在家里歇口气。

和大伯不一样,秋雨斜斜落下时,父亲会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前读书看报。父亲虽是农民,却格外爱读书,他读的书报很杂,有什么就读什么。

不识字的母亲,则在厨房里给我们做好吃的,或是发面蒸馒头,或是动手做包子,抑或是用瓦罐炖鲜汤。母亲平时没工夫做,只能得闲的时候才肯操持。烟囱里飘出的炊烟,混着食物快熟时漫出来的香气,和门外飘着的细雨格外相衬,成了我记忆里抹不去的画面。